

红军创建首支无线电队伍前后

□ 程宇一 曹明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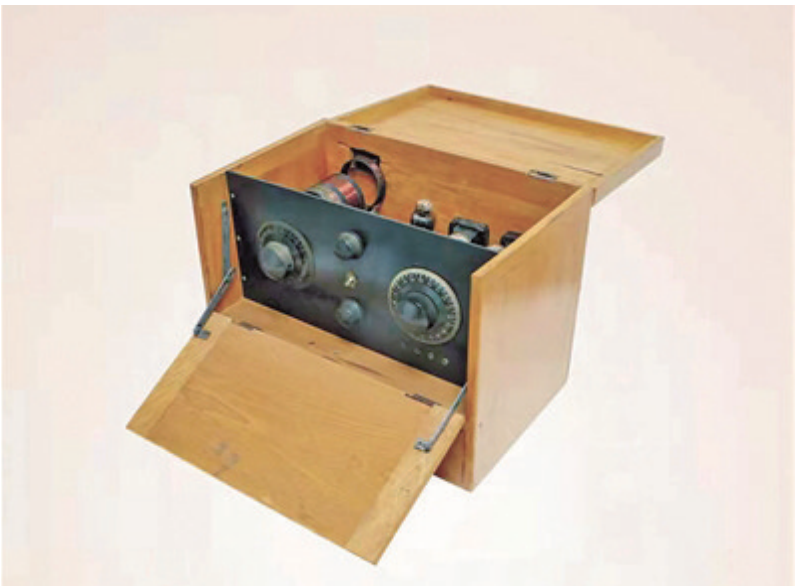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人民通信兵从缴获的半部无线电台起家，在战火中迅速成长壮大，成为我军一支重要的作战力量。红色电波传递党的声音，发布党的命令，在革命战争时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星火燎原的土地革命到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从烽火硝烟的抗日战争到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再到众志成城抗美援朝战争，红色电波保障了战场指挥通信，确保我军行动协同高效；开辟了隐蔽战场，加强对敌情报侦察对抗；建立舆论宣传窗口，扩大我党我军政治影响。

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在中央苏区组建。此后，红军利用战场缴获、办班培训、实时运用等方式，克服电台装备短缺、通信人才匮乏、运用经验不足的困难，发展壮大了我党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为中央制定决策部署、部队灵活快速行动提供了有效的情报和通信保障，对突破敌人军事封锁，赢得战争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半部电台”奠根基

在组织“围剿”红军行动时，国民党已拥有长波电台，并使用摩尔斯电码发报，而红军还主要依靠骑马、传令兵、哨音、军号声等运动通信和简易信号通信。毛泽东曾感慨，没有无线电通信，部队联络不通，严重影响了作战指挥。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余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12月底，敌第18师两个旅深入苏区腹地龙冈。战斗中，红军趁敌立足未稳，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敌，活捉师长张辉瓒，并缴获其使用的1部弹簧式灯座的15瓦无线电台，电台的收报机和充电机完好，但发报机损坏，无法进行正常通信联络。电台的报务员王净、吴如生、韦文官、刘寅和机务员刘盛炳等人，经过动员自愿参加红军，成为红军第一批报务人员。3天后，红军在东韶战斗中歼灭敌军第50师，缴获了1部完整无损的15瓦无线电台。1931年1月3日，毛泽东和朱德亲切接见王净等人，并授命王净着手组建红军第一个无线电台班组。朱德指着缴获的电台说，“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

1931年1月6日，红军总参谋处的东屋被布置成“报房”，王净等人对这一部半电台进行第一次安装调试机。此时，这一部半电台还不能建立



1930年12月，红军缴获国民党军的“半部电台”

无线电通信，只能用来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经过调试，电台接收到第一束飞驰的电波。毛泽东第一次看到电台送来的电讯新闻后称赞：“这是没有纸的报纸啊！”此后，红军开始利用这部电台捕捉敌军电台信号，了解敌人动向，为红军把握战机、正确决策、出奇制胜提供了有力保障。

1931年1月中旬，红军在江西南都小布镇组建了第一个无线电队，王净为队长，冯文彬为政委。后来，中共中央又派伍云甫、曾三、涂作潮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加强了无线电队的力量。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对无线电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朱德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去电台问问，有没有什么新闻。毛泽东也非常看重无线电通信，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红一方面军从闽西向赣南的兴国地区集结，为突破敌人包围圈，需利用夜色从两股敌人之间相距约20公里的缝隙中跳出去。行动开始后，各级指挥员和政工干部深入连队，要求严格做好行动的保密工作。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在夜色中还有一个可能暴露红军行踪的漏洞——电台的无线电信号。他马上找来电台人员询问，得知缺少电键，电台就不能工作。于是他派人收集来电键交给警卫员并交代：不到目的地，不许任何人拿走电键！

针对以前在国民党军工作的技术人员，毛泽东多次指示，要做好电台人员团结工作，政治上要信任，甚至亲自指定王净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对于无线电技术人员的业务管理和生活安排，即使当时红军经费紧张、给养匮乏，无线电人员每月津贴相比普通战士也只多不少，还优先配备了运

输马匹。在红军领导人的关心下，无线电通信队伍逐步壮大。

白手起家育人才

红军无线电队成立后，主要依靠留用原国民党军的技术人员。红军总部意识到，要充分发挥无线电台作用，迫切需要无线电技术人才。1931年1月28日，毛泽东、朱德联名签发《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在江西南都组织第一期无线电培训。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经常抽出时间给训练班作形势报告、上政治课，毛泽东鼓励大家尽早建立空中桥梁，把被分割的苏区用无线电波连接起来，朱德则勉励大家在建设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中要不怕困难。当时，训练班教学条件非常简陋，学员们把树荫当课堂，石板当桌子，用左手大拇指当作电键来练习，铅笔用到手指捏不住了，还套上小竹管继续使用。4个月里，王净为学员们教授报务和机务，还用木块、铁片制作电键，用旧铜线制造电码训练器等训练器材，供17名学员练习，培养了第一批无线电通信人员。

当时，由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严密封锁，生产通信器材物质条件困难，王净发动大家就地取材，把铜钱熔炼成薄铜板用来加工制作电器元件，将羊角研成粉末压制成胶木件代用品。在无线电队伍官兵的不懈努力下，红军最终组成了中共中央无线电通信网。

此后，训练队扩建为红军通信学校，直到长征前夕，共举办无线电训练班11期，先后培训报务、机务、电话、司号、旗语等各类通信人员

2100余人，对以后的中国革命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反“围剿”中露头角

在复杂激烈的反“围剿”斗争中，王净提出可以用收报机侦收敌电来获取情报。他让通信班天黑后把天线架在山顶，提升通信效果，天亮前撤回以免暴露。当时国民党军队译电机关和指挥官还没意识到无线电保密的重要性，每次电台开始联络时，就先明语问对方在何处、谁在主要方向，王净和无线电通信队成员就不分昼夜地监听、捕捉敌军电台有用信息。王净熟悉国民党军队电台呼号和电台报务人员发报手法，因而能从收报机信号中判断发报人姓名，进而判定敌军到达时间、地点、番号、分布和行动意图，掌握敌人的行动方向、退却路线、到达位置、指挥命令等信息，为红军总部领导制定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红军依托这些重要信息集中兵力，从敌人力量相对薄弱部实行突破，直接促成了第二、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

红军捷报频频传来，毛泽东在苏区军民集会中高兴地说，我们工农红军也有了千里眼、顺风耳。1931年5月，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缴获了国民党军公秉藩部的一部功率为100瓦的电台。无线电技术人员通过这部电台，与上海中共中央取得了通信联络。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开幕。在会场不远处的几间土房里，王净、刘寅等红军电台的技术人员，通过之前缴获的那部100瓦的电台进行文字广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的消息，很快化作空中电波传向远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最早对外播发新闻的通讯社“红色中华通讯社”（即新华社前身），由此宣告成立。我党第一次通过无线电台越过了敌人的“铜墙铁壁”，向全国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和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喜讯，向全国人民传播了胜利的佳音。

（摘自2022年2月24日《中国国防报》）



悬挂马恩列斯肖像的

弄口国民学校

□ 俞长寿

新中国成立前，敢在学校里悬挂马恩列斯肖像的学校还真没听说过，因为当年在战场上已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府对社会进步思潮打压得很厉害，一旦发现进步活动，连军统特务都会上门抓捕，那么进步人士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

有一次与蔡文祥先生聊起新中国成立前后筑桥的一些社会情况时，他讲到了弄口国民学校（前身为市立第八民众学校）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

年已86岁高龄的蔡文祥记忆力很好，也很健谈，说起在弄口国民学校读书时的所见所闻如同回到了那个年代。

根据蔡文祥的回忆，他9岁到白石王家井胡家庵上私塾，10岁时转读弄口国民学校。弄口国民学校是一所六年制小学，每个班级约有三四十人，全校共约七八十人，是不同年龄的孩子合在一起学习的混合班。由于蔡文祥上过一年私塾，已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所以直接就读二年级。

蔡文祥介绍说，当年弄口国民学校在筑桥枸桔弄老街花园台门内。这里是清代曹氏树木场旧址，因树木场有花园而得名。花园台门里面有五间平房，弄口小学就在这五间房子里。学校设有一个学生操场。他入学时的学年开学典礼在学校礼堂举行，礼堂正中挂了孙中山肖像，两侧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肖像，墙上还贴着忠孝仁义礼义廉耻等文字。当时学校教学严谨，周一上课前，都有训导主任引领学生诵读孙中山遗嘱和《十二守则》。他上三年级时，班主任蔡豁老师开始教学生学唱进步歌曲《鬼怪歌》。学会后，蔡豁老师就经常叫学生们唱这首《鬼怪歌》。为防止被外人听见，每次歌唱，老师都叫学生压低嗓音。岁月如梭，如今时间已过去70余年，《鬼怪歌》的整首歌词，蔡文祥已记不清了，但前几句还能记得：“今年鬼怪多，往年鬼怪少。板凳爬上了墙，灯草打破了锅……”蔡文祥说：《鬼怪歌》可能是老师自己根据《古怪歌》填词的。不过，《鬼怪歌》只唱了两年多时间，在他上五年级时，班主任蔡豁老师突然离开了学校，从此再未见到过，这首进步童歌也就没人领唱了。

蔡文祥对学校当时的情况记忆清晰，感触颇深：由于弄口国民学校大门出口路朝北，沿街都是民房，人们要经过一个高墙台门才能看到小学的房子，环境比较冷僻，因而学校的教学情况不大为外界所了解，礼堂悬挂马恩列斯画像和他们歌唱进步歌曲并未受到什么干扰。1948年底，弄口国民学校迁至花园兜跨塘庙，马恩列斯画像依然挂在学校的一个房间里。

蔡文祥那时年纪还小，不懂得什么，长大以后，总觉得当年弄口国民学校应当是由地下党或进步人士在掌控，不然不会一直在学校悬挂马恩列斯画像，或许学校本来就是地下党的一个秘密交通站。“那时我曾多次见到一些西装革履的年轻人在枸桔弄活动，有时他们会走进我们学校去。还有一些在枸桔弄挑担卖麻油的行贩，新中国成立后一夜消失，后来听说这些挑担卖麻油的人，多数是地下党。”



著名史学家毛昭晰先生在《古韵弄口》序文中写道，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6年至1948年，他作为浙江大学进步学生，曾多次到艮山门外枸桔弄开展进步宣传，有时夜宿就住在花园台门。蔡文祥当年所看到的那些“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是否就是毛昭晰这样的进步青年学生，这有待更多的求证。

蔡文祥当年保送入读浙江医学院（今浙江大学医学院）后，曾师从著名毒理学家黄幸纾教授，毕业后分配到温州卫校任教。1978年调入温州市卫生干部进修学校，历任教务主任、副校长、校长，为温州市第六届政协委员。他感慨地说：“弄口国民学校是杭州解放前少有敢于悬挂马恩列斯画像的学校，是杭州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所红色基因小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弄口国民学校更名弄口小学，20世纪80年代初并入杭州笕桥小学。

（摘自2022年3月24日《人民政协报》）

红4军在宁都的筹款收据

□ 曾庆圭

1929年1月14日，为打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会剿”，以解决严重的经济给养困难，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4军主力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踏上转战赣南的艰难行程。2月13日，在大柏地消灭了尾追之敌后，毛泽东、朱德指挥红4军主力乘胜进占宁都县城。国民党守军慑于红军在大柏地胜利的声威，不战而弃城逃窜。

2月13日上午，红4军整齐列队进入县城。此时，街道两旁静悄悄的，不熟悉红军队伍的老百姓都躲了起来，店铺也都关着。

红4军入城后，毛泽东、朱德、陈毅及司令部、政治部机关驻在城西温屋。在这里，毛泽东、朱德接见了中共宁都县委和赤卫队的负责人，向他们介绍了红4军进军赣南的目的，并对宁都今后的革命斗争作了指示，还要求他们发动群众做好帮助红4军筹措款物的工作。

遵照指示，中共宁都县委和赤卫队的负责同志组织人员上街宣传红军政策，张贴安民告示。不少商铺老板看见红军进城后秩序井然，便纷纷打开了原本紧闭的店门。

当天午后，由当地商家临时成立的

“宁都县招待处”的几名执事先生，来到红4军军部。陈毅在厅堂对他们说：“本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是共产党、毛委员领导的工农武装，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军队，对于商人极力保护、纪律森严，毫无侵犯。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已致信宁都商界，请你们代筹军饷和军需品。”

陈毅的一席话，赢得了各位执事先生的称赞。他们纷纷表示，将立刻分头到各商家做好筹款政策宣传，保证顺利完成筹款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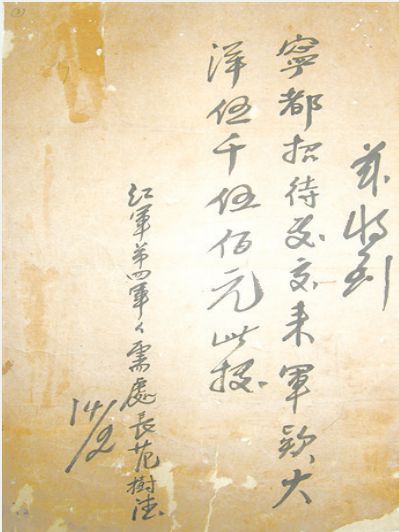
红军的筹款政策获得了中小商人的真诚拥护。当时只有四五五千人的宁都城，不到一天工夫，就筹得白布300匹，草鞋、袜子各7000多双和5500块银圆，由执事先生邱宝泉等人送到红4军军需处。

红军也开具了“筹款收据”：

兹收到宁都招待处交来军款大洋伍千伍佰元此据。
红军第四军军需处长范树德

14/2

这是红4军主力离开井冈山以来，第一次得到这样充裕的军需补充，极大地振奋了军心士气。第二天拂晓，百姓们都还



没起床，红军指战员就轻手轻脚地把借来的门板上还各家，又把借的各件东西如数放到各家各户门前。随后，部队在毛泽东、朱德率领下向黄陂、小布、东园进发。

如今，这张见证了宁都人民与红军鱼水情深的筹款收据，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被珍藏在宁都县博物馆。

（摘自2022年7月10日《解放军报》）



投笔从戎 绝食殉国

巫恒通：

□ 邱冰清

在江苏省句容市烈士陵园内，有两尊半身铜像，那戴着副眼镜，双眼炯炯有神的青年男子，就是当年与日寇进行不屈斗争，最后壮烈殉国的抗战英烈巫恒通。

巫恒通，字天侠，1903年出生于江苏省句容县白兔镇栢溪村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求学期间，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毕业后，在无锡县立第四小学（梅村小学）任教，先后任句容县女小学校长、南通师范附小教师、句容县督学。1936年任泰兴县教育局局长。1937年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3月，被国民党泰兴县政府以擅离职务罪名逮捕入狱。

1938年夏，新四军挺进江南敌后抗日，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10月，巫恒通被保释出狱，与陈毅、管文蔚畅谈抗战大计，并送儿子巫健松到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学习。1939年3月，成立句容县民众抗敌自卫团，主动接受新四军指导。11月，句容县民众抗敌自卫团改编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新编第3团，任团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军乘机反复“扫荡”茅山地区，巫恒通在江苏句容多次指挥部队击退日军的突袭。日、伪军对他恨之入骨，杀其兄，掳其子，毁其家。巫恒通慷

慨陈词：“坚持抗敌，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有敌人在，房屋被毁，人被杀，这是必然遭遇。只有把敌人驱逐出国境，才能保全生命财产。现在什么是我所有的呢？我只有抗战到底的决心。这是我应有的，而且是我应尽的天职。”4月，巫恒通任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句容县长。

1941年9月6日，巫恒通在大坝上村遭到日军包围，负伤被俘。日军百般威胁利诱，并将其幼子巫健柏带到囚室企图软化其意志。巫恒通对幼子说：“你要永远记住你伯父、伯母和叔父是怎样死的，永远记住你爸爸是怎样至死不投降的……你爸爸就要像文天祥、史可法那样为国牺牲了，你要继承父辈遗志，长大后献身革命，做一个有志气又有骨气的中国人。”巫恒通绝食8天，壮烈殉国，时年38岁。

印章、毛毯、方桌、长凳……在江苏茅山新四军纪念馆里，陈列着抗战时期巫恒通烈士使用过的物件，表现出烈士艰苦朴素、坚强乐观的人生信念。“我们家人一直都是听党话跟党走，做老实人，做老实事。”“巫氏一门忠烈，前赴后继保家卫国，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将代代相传。”巫恒通的孙子巫充实这样对记者说。

（摘自2019年1月7日《人民日报》）